

第二版

再論中國

張五常著

信報「張五常論衡」集

再論中國

作者

張五常

出版及發行

信報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四樓A座

(英皇道郵箱三四八九二號)

印刷

信報有限公司

定價

港幣三十五元 美金五元正

初版

一九八七年六月

第二版

一九八七年七月

封面題字

羅森

設計

駱展才

本書版權爲信報有限公司所有·不得翻印

給
中國的青年

思想雖然抽象，但卻比萬里長城更有頑固的存在性。一個思想，無論是對還是錯，一經表達了，就不容易消逝。只有人可以想，也只有人才有責任把思想表達出來。

前言

這本書是繼《賣桔者言》及《中國的前途》之後的第三本《論衡》結集。轉眼之間，《論衡》面世已三年半了。我想，要不是讀者——尤其是中國的讀者——能給我那樣的鼓勵，那樣的熱烈反應，《論衡》是不會像今天那樣歷久猶新的。在幾年之間寫出九十多篇學術性的論文，可能是近乎世界紀錄，更何況這些文章大都是專注於產權的經濟問題上。

讀者們認為《中國的前途》比《賣桔者言》難讀。這觀點是對的。多向理論那方面寫，內容當然較為抽象。我知道絕大多數的讀者是經濟學的門外漢，但爲了中國的發展，我卻不能不談那經濟學行內認爲是近於「深不可測」的產權問題。

可以說，這一本書——《再論中國》——也是不太容易看。我希望將來執筆時，會寫得較為通俗易懂。《再論中國》的文章，除了三數篇外，出發點是針對中國目前在體制改革中比較重要的概念與理論上的謬誤。我很明白中國的情況，知道書生之見無足輕重；但既然自己又認爲深知經濟發展之道，在目前只爭朝夕的中國經濟改革中，寫這些文章便使我有「義不容辭」之感了。

由於文章是關於中國的「時弊」，本書中的理論就不能不談得比較「專」、比較深入。其中每一篇文章，我不能期望所有讀者都能夠理解，能夠清楚地明白。但我認為，某一些中國讀者，在某一個時代，某一個地方，能夠深知我所說的，不會是苛求。能達到這一點，我於願已足。作為一個關心中國的經濟學者，在理論上能夠闡釋的，我已盡我所能。

本書依照《賣桔者言》的格式，把文章分類編排，希望讀者能較有系統地閱讀。各篇發表時的先後次序，可見於書後的附錄。

張五常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於香港

目錄

頁碼

前言

壹、開首的話（二篇）

再論中國——序

經濟學可誤導中國的經濟改革

貳、中國進展的大略（五篇）

五年過去了，中國的去向又如何？

與鄧小平商榷

（附後記）

《與鄧小平商榷》的一點補充

拋磚引玉與急功近利

福建行

參、資產的權利界定（四篇）

所有權與「會貶值」的資產

三

九

十七

三十三

四十七

四十九

五十二

五十八

七十一

出售土地一舉三得……

八十

資產轉讓爲何重要……

九十

私有產權是獨步單方……

一〇五

肆、勞力的價值（三篇）

開放外貿是勞力升值的最佳捷徑……

一一九

件工制度有所不逮……

一二六

剩餘價值與兩極分化……

一三二

伍、外資、外貿、外匯管制（四篇）

外資的中國觀——並論匯管的影響……

一四三

毋須優待外資……

一五〇

外匯管制可以休矣……

一五六

外匯管制非去不可……

一六七

陸、爲幼者語（三篇）

補鞋少女的故事——爲中國的青年說幾句話……

一七七

楊小凱的訪問……

一八三

也談學運……

二〇五

開首的話
(二篇)



再論中國——序

八六年六月三日

一個從事學術研究的人，花了一年半載的心血作研究，寫完了文章，或一本書，就會覺得若有所失，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空虛」。也許這是腦力與勞力的不同之處吧？

我在八五年五月發表了《爲一絲希望寫文章》，完成了二十一篇關於中國制度改革的論文，再鼓其餘勇，花了一個月時間將《中國的前途》整理成書，難以形容的「空虛」又照例地來臨了。這感受我是慣了的，但這一次有點特別。我已年近五十，好的創作日子無多。

記得四十歲那一年，我無意中讀到史德拉的關於經濟學者的「最佳創作年齡」的統計數字，曾對自己說，到年近五十時，我多年來所積聚的理論思想就不能再等了，要傾全力出擊。七十歲的人還寫得出好的經濟學文章，但有創作性的重要作品呢，五十五歲之後是史無前例的。如今既已年近五十，我想，就算我得天獨厚，可以寫得出石破天驚的論文的日子，最多也不過四、五年而已。

所以在《中國的前途》完工後，我就來一次「沙場秋點兵」，計算一下我積聚下來而自己認爲是非寫出來不可的「剩餘思想」。但屈指一算，寫出這些作品一共需時八年！一時間心亂如麻，也體會到高斯的困境：他

有多個想了幾十年的題材，文章還未問世，但他已七十五歲了。

那是去年六、七月間的事。不得已而求其次。我想，在學術上搞了這麼多年，多三幾篇國際性的文章，對自己的事業前途無足輕重；沒有「里程碑」水平的，不寫也罷。我於是決定花點時間，把要寫出來的「剩餘思想」權衡輕重，然後逐步由重要的寫起，寫到哪裏就是哪裏，盡己所能，心安理得，也就算了。言行一致，甚麼事我都以自我為出發點。能寫下自己認為是重要的思想，使後來的人能加以改進，我就不會埋怨自己有負教導我的人的期望——這不是自我是甚麼？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恰巧在那時，深圳特區卻出了問題。甚麼「輸血」、「拔針頭」的大字標題，在香港的報章及雜誌上觸目皆是。我當時想，經濟特區其實沒有甚麼特別，但畢竟「特區」是中國開放的代表作，若不成功，中國的前途又會怎樣？雖然這麼想，我的集中力還是放在那些「剩餘思想」的處理問題上。

有一位在新華社工作的朋友，是我四十年前在佛山唸書時的師姐。她唸高三時我是小六；但因為我的頑皮遠近知名，她倒記得我。由於這一點微妙的關係，近幾年來我們見面時就多談幾句。又因為大家都喜歡說說往事，在不知不覺中就有了姊弟之情。

去年的八月初，我跟這位師姐談起深圳的問題，我建議假若我真能得到中國的合作，毫無保留地給我所需的關於深圳的資料，而又不干涉我要發表的意見，我會考慮用一年之功去分析深圳的經驗的。這是強人所難，就是香港政府也難以這樣「開放」，我又何妨口出大言？毋須付出代價的建議或承諾，與「慷他人之慨」，看

來有異曲同工之妙！

豈料到了九月，師姐給我電話，說我所要求的半點問題也沒有。這把我嚇了一跳。幾天之後，深圳派了兩位先生來見我，用語肯定，轉述那邊對我的要求完全接納。我還是半信半疑，請他們把我寫的兩本書，〈賣桔者言〉與〈中國的前途〉，帶返深圳，指明要讓那裏的主事人先看。我想，我對共產政制的觀點，明顯不過；雖然書中這些觀點都是學術性的，但畢竟措辭尖銳，得理不饒人，而有感而發的牢騷又往往跟分析連在一起，要他們接受也非易事。

去年十月，我到深圳會見那裏的有關人士，我再三重複對資料開放與言論自由的要求，但想不到他們再三加以肯定的承諾。我提出了要在深圳僱用三位助理研究員的條件，他們也同意了。

回到香港後，我跟兩位朋友進午餐時，無意間透露此事，說自己如何口出大言而「惹禍上身」，可能要花一年或以上的時間作深圳特區的研究。我又說到需要一筆經費。過了幾天，其中一位朋友告訴我，她跟查濟民先生說了；查先生認為這項研究有意思，樂意資助。我後來會見查先生，談天說地，而關於研究經費的事只說了那麼一兩句（其實，爲了研究中國而向人提出任何要求，我當時是相當猶豫的）。但不久之後，查先生卻把一張捐贈給香港大學的支票寄來了。作爲一項研究金，港幣數十萬元不算很大的款項。而令我佩服的是，查先生一概不過問，毫不顧慮，沒有任何附帶條件。這態度，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是不容易見到的。

有了中國的承諾與查先生的資助，我怎能裹足不前、臨陣退縮？既然「弄假成真」，我又何妨「將錯就錯

「，把「剩餘思想」轉爲「再論中國」？我也想起四年多前高斯對我說過的話：「選擇研究題材是一項賭注，哪個題材是重要的，事前往往難以定奪；但假若你一定要作出取決，我的答案是，我再也不想不到哪一個題材能比中國的制度改革更重要！」這樣，我的選擇就決定了。

中國的思想開放是真實的。當我跟朋友如此說時，他們都有懷疑。有的不了解我的新交，竟然聯想到「統戰」那方面去。當然，目前還有很多的中國人，作繭自縛，不敢暢所欲言；國內的傳播媒介，還是往往報喜不報憂，浪費了重要的資源，也對中國青年的知識大有損害；而某些香港人的言論，越來越莫名其妙，往往深不可測。但這一切，都不足以證明我的觀點是錯了的。

反而從深圳實地調查研究所獲的經驗，卻有力地支持着思想開放這一觀點。我的調查作風從來不變——單刀直入，百無禁忌——而在國內我不覺得我這作風是需要改變的。深圳的主事人顯然是言而有信的：他們對我要調查或索取哪一些資料，從來不加以婉拒。從事實證研究工作二十五年，資料的可靠與否我一目了然，本領再大也瞞我不過。這種明來明去的合作，不是思想開放是甚麼？

深圳的研究工作只做了幾個月，我就發覺這經濟特區有兩個事前沒有想到的特點，增加了這項研究的重要性。第一，可能因爲深圳與香港爲鄰，那裏的演變現象比國內其他地區的有較大的極端性。這就是說，辦得較好之處和遇到的困難，都遠比其他地區顯著。同樣，深圳的興盛與倒退，一上一落，也特別令人矚目。從經濟研究的角度看，比較極端的現象倒是大有幫助的，因爲研究者不需觀察入微才能抓着要點，也不需依靠詳細的

數字來衡量情況的演變。另一方面，比較極端的現象能讓我們有一個可靠的準則，藉以理解國內其他地區的大明顯而又有同類性質的演變。換言之，很多有關深圳的經驗，其實是中國整體經濟的「聚光」的寫照；若不研究深圳，我們就會忽略了其他地區的不太明顯但卻甚為重要的發展。

深圳的第二個重要特點，就某方面而論，它確是鄧小平所說的試驗區。這不是說深圳所行的某些政策是國內所無（除了一些不太重要的「特惠」及特別受到中央的「關注」之外，特區沒有一個與中國他區不同的制度），而是說，中國所試行的新政策，在深圳往往較有力地推行。因此，研究深圳，可使我們較易推斷中國制度改革的去向。

是的，上述研究的最大收穫，就是我們可以從深圳的角度去看中國的制度轉變，以及這個轉變所遇到或行將遇到的各種困難。這可以說是深圳對中國的一大貢獻。但在我個人來說，經過了八個月的研究，要開始作具體的分析了，我究竟應從哪一方面下筆呢？寫中國，還是寫深圳特區？當然，中國的整體比深圳重要。但我這些日子來所累積的關於該經濟特區的資料，怎可以棄而不用呢？

我想了很久，就決定了如下的解決辦法，把文章分為兩個系列：先寫《再論中國》，然後再寫深圳及其他地區的經驗。前者以理論為主，以事實資料為輔，論點是集中於中國改革的困難，而且盡可能提出一些可行的解決辦法。後者以地區的資料及經驗為主，以理論分析為輔，而論點也是偏重於「困難」那一方面，雖然值得一讚的地方我是不會低貶的。

因爲這些文章都是寫給一般讀者看，我會盡可能將理論簡化。話雖如此，有些文章，讀者還是要多看幾遍才能體會其意的吧？另一方面，我從來不相信作調查研究的人的艱苦經驗，一定要讓讀者分擔的。所以關於資料的處理，我不會不厭其詳地「表達」無遺。我只會將自己消化了的資料的大概，像「故事」般陳述。圖表及註腳都不用了。

經濟學可誤導中國的經濟改革

很多人認為經濟學的派別很多，而經濟學者之間的糾紛或不同的見解又層出不窮，所以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是沒有肯定的結論的。因此，在實證或實用上，經濟學就派不上用場了。

不同見解是科學上應有的事。倘若任何問題都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沒有科學可言了。事實上，經濟學行內的高手都知道，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比外行人所說的小得多。他們都明白：見解的不同是由於假設的不同、重點的處理不同，或資料及經驗的可靠性不同。在邏輯推理上，大家都大同小異，往往是毫無二致的。就算是近二十年來的貨幣理論的爭論，撇開大家所同意的不說，剩下來的不同之處，就只不過是：（一）貨幣流通的速度大致上是否固定（資料證據不容易量度）；（二）人們的預期是否明智（預期是怎樣形成的不易明白）；及（三）貨幣是甚麼（有了電子核算及國際間的需求，貨幣量的增減愈形複雜）。

英諺有云：有道理的人都會彼此同意的。我同意這句話。但在某種情況下，有道理的經濟學者彼此不同意，就如任何科學上有道理的學者彼此不同意一樣，是因為大家要強調不同的見解而增加辯論的機會，或大家都不知道答案，互相提出不同的假說，希望達者為師。那是說，強調不同或把不同的觀點擴大，是科學的進步

必備的條件。很不幸，由於進步的需要而引起的不同觀點或爭論，往往為不明其中奧妙的人所誤解，以為經濟學的結論五花八門，毫無標準可言，沒有科學實證的價值。

史得拉 (George J. Stigler) 說得好：「一個物理學的門外漢，膽子再大也不敢在物理學上發表謬論；而一個經濟學的門外漢，卻會說：『我不是經濟學家，但我認為這經濟問題應如此這般解決。』為甚麼不少發言者，甚至一般人，都會認為自己是『準』經濟學家呢？這顯然不是因為眼見經濟學的行內人常有爭論（其他科學的爭論是不相伯仲的），也不是因為經濟學可以無師自通或甚至是一門連自修也不需要的學問（翻閱任何專業的經濟學報，其艱深的程度與其他嚴謹的科學沒有分別）。

我以為「任何人都可能自以為是經濟學家」這個現象之所以出現，有三個原因。第一、經濟學是用以解釋人類行為的。既然是人，對自己的行為當然都有自知之明，所以認為自己的解釋是對的（但「自知之明」不能一般化，所以算不上是科學）。第二、經濟效果的利與害和每個人都有切身關係，所以對經濟的特別關注便溢於言表（報章是有經濟版而沒有物理版的）。第三、有一些算是學過經濟學的人，的確確是一竅不通，但又亂說一通；這使行外人一聽就覺得不大對勁，於是認為經濟學不過如此而已，自己似乎更勝一籌（有師而不通，令人有無師勝有師的感覺，而這感覺也可能是對的）。

中國要搞經濟現代化，重視經濟學，並且在經濟觀點那方面思想極為開放，這是令人欣賞的。然而，背誦馬列經典這麼多年，一旦引進外間五花八門的經濟理論，花多眼亂，何去何從的困難是不能輕視的。長久以來